



第五十六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108 (b)

宏观经济政策问题

国际金融体系与发展

国际金融结构和发展，包括发展中国家
与发达国家间的净资金转移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金融稳定与市场效率：全球公益视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说明

导言

1. 大会第 55/186 号决议第 7 段请秘书长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协作，向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供就国际金融稳定是全球公益问题所进行分析的资料。本说明就是根据这一要求提出的。本说明中的讨论还与即将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有关，特别是国际金融合作促进发展和体制问题的议程项目。¹

2. 开发计划署支助的关于全球公益物的出版物包括有关金融稳定是全球公益的一章，是要求提出此说明的起因。² 这一章认为，金融危机及其造成的过度金

* A/56/50。

** 由于应邀就报告草稿发表意见的一些人的耽搁，本报告到 2001 年 7 月 10 日才提出。

¹ 这次会议的资料可参看 <http://www.un.org/esa/ffd>。

² 见 Inge Kaul、Isabelle Grunberg 和 Marc A. Stem 合编（1999 年）《全球公益物：21 世纪的国际合作》中的 Charles Wyplosz（1999 年）“国际金融稳定”[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英文本第 152-189 页。

融动荡是一种全球公害。即便在国家一级一切良好，这些危机仍能给各国造成危害，其影响可以任意蔓延到邻国及整个区域。作者强调了自我形成危机的严重性。触发这种危机的是信息不平衡和不确定性，此时发生了丧失信心的情况，而投资者的盲从行为为其推波助澜（Wyplosz 1999 年，英文本第 161-163 页）。³ 这本书出版之后，尤其是其中有关金融稳定的一章，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在学术界、市场行动者、民间社会和公共决策界引发了一系列辩论。⁴ 这些辩论以及开发计划署有关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显示，从全球公益物的角度研究金融稳定和市场效益问题，有助于获得对政策有意义的新看法。全球公益使人们关注政策选择方案，强调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实际可行的改革，从而使各方都有积极性采取行动并且向前推进。

3. 具体而言，可以列出四个政策要点：

- 为使“金融稳定和市场效率”全球公益有助于促进所有各方的发展，其设计必须着眼于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条件，并反映国家、行动者和利害攸关者的多样性。
- 广泛参与国际金融决策不是一种恩惠，而是必须做的事情，才能避免集体行动和信息问题。
- 只有形成所有组成部分——国家、区域和全球要素，以及必要的公共和私人贡献，“金融稳定和市场效率”全球公益才能出现。
- 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对于上述领域的进步至关重要，从工业国家中央银行的造币收益⁵ 提供资金最为合适。

4. 以下各节将详述这些研究结果。如结论所述，这里讨论的一些政策改革已经开始出现。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是初步的，往往是临时和孤立的情况。即将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将提供一个机会，融合这些改革进程，调整全球金融结构，以适应今天的发展现实和目标。

³ 这里不妨介绍一下 Wyplosz 有关货币外差因素与非货币外差因素之间的区别。作者写到，（1999 年，第 159 页）：“世界金融市场不仅是极其强有力的体制，而且也是强有力的外差因素载体。许多外差因素是货币外差因素：国家和外汇风险溢价通常是基于广泛的信用评级行业，这个行业收费监测世界各地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但是，即使信用评级行业也面临着信息不平衡问题。”因此，市场有时不能提前适当确定风险的代价。此外，Wyplosz 接着说：“[1999 年]一些外差因素是非货币外差因素。例如，[1999 年]泰国发生危机，市场反应猛烈（逆选择）而毫无理性，使危机扩展到整个东南亚，并且殃及巴西、波兰、俄罗斯和其他几个国家。人们无法为这种外差因素适当定价。目前刚刚出现市场溢价，但是未能顾及蔓延现象。”

⁴ 有关应用全球公益物概念研究金融稳定和市场效率问题的某些书面后续讨论，可见 Camdessus（1999 年）、发展委员会（2001 年）、Eichengreen（2001 年）、国际金融机构咨询委员会（2000 年）、Ocampo（2001 年）、Scholte 和 Schnable（2001 年）、世界银行（2001 年）。

⁵ 造币收益是政府通过其发行货币权获得收入的能力。

- 一. 为使“金融稳定和市场效率”全球公益有正面用处，并有助于促进所有各方的发展，其设计必须植根于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条件，并反映国家、行动者和利害关系者的多样性。

5. 市场是最好的公益物。市场向所有希望并能够参与经济交往的人们开放。⁶ 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是不能排斥的，因此，符合划分公益物和私人货物的主要标准。⁷ 市场也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非竞争消费。就是说，一个人利用市场，不会减少其他人利用市场的机会。相反，市场效率往往会得益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多样化。⁸

6. 适用于一般市场的东西，对于金融市场同样适用。就金融市场而言，象所有其他市场一样，经验显示，不受束缚的经济交易不一定是最有效的。市场受益于下列公共体制（中间商品）的支持：法律框架，独立司法制度，适当的会计标准，以及有助于提高透明度、降低风险和减少市场参与者交易成本的其他准则和过程。⁹ 然而，市场本身并不是目的。市场是提供货物的手段和机制。市场本身应该能够推动和帮助一个国家发展。因此，对于市场结构和运作，应该从其对社会较大目标的贡献加以评估。就金融市场而言，这方面关键问题是适当类型的资源是否流向能最有效得到利用的地方。实现这一目标，往往不仅必须使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的市场体制化，而且必须加强公共政策刺激，使市场行动者能够把私人和社会收益更好地结合起来。

7. 我们通常统称为“全球化”的各种过程使国家边界变得畅通无阻。因此，国家公共政策决策者最好经常与其他国家协商，组织将金融市场纳入体制的行动。例如，使国家政策符合国际守则和标准就能吸引更多的外部资本，增加国内资源，从而促进实现国家发展目标。这种政策统一是使“金融市场”国家公益变为全球公益的一种方式。

8. 另一种方式是，随着开放程度提高，国家金融市场会受其他国家的市场跨界外溢效果的有利和不利影响。正如 Ocampo（2001 年，第 10 页）所指出，在目前情况下，主要工业国家是“商业周期/决策者”，新兴市场和尚未成形的市场是“商

⁶ 当然，市场也有准入障碍，一个人只有当拥有一些东西进行贸易时才能利用市场。这个体制往往对穷人的用处不大，因为穷人缺乏购买力或使他们能够生产和交易货物或服务的手段。然而，准入问题必须同货物的收益/成本的公共性区别开来。尽管穷人缺乏进入市场的机会，但他们仍然热切关注市场，因为市场如果崩溃，他们也会受到影响，并且陷入更广泛和更严重的贫穷境地。其他市场准入/进入问题还有许可证交易，例如银行许可证。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减少信息不平衡。一旦获得某种交易的许可证，行动者就可以自由进入市场。

⁷ 关于公益理论的详细讨论，可见 Cornes 和 Sandler（1996 年）。

⁸ 至关重要的是，不要把市场体制、公益物与该体制促进的许多市场交易的竞争性相混淆，也不要与通常在市场交易的货物的私人性质相混淆。

⁹ 关于这一点，可见 Lindblom（2001 年）。

业周期/政策接受者”。用他的话说，（同上），“中心经济为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出其决策者尚未内化的外差因素。发展中国家对这些外差因素感觉强烈，它们必须适应这些因素，但是，缺乏供应国际货币能力所能提供的自由度。”

9. 1990 年代末金融危机显示，发展中国家发生危机时，或者说在允许其金融行动者参与海外信贷活动风险过大、过多时，主要金融市场也会受到影响，变得战战兢兢。所以，外差因素在不同国家集团之间来回摆动，尽管对较小市场的影响通常比对较大市场的影响更严重。这说明，使金融市场在所有国家都起作用。是所有各方的共同利益。然而，如前所述，“使市场起作用”就意味着使其服务于国家的发展目标。

10. 因此，各国决策者（特别是目前觉得属于 Ocampo 的“政策接受者”类别的人们）在选择其金融市场发展战略时，必须澄清以下五个问题：(1) 金融市场要服务于哪些国家发展目标；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何种类型的市场体制和补充性公共政策工具和机制？(2) 在多大程度上，仅仅通过国内政策行动就能实现所需要的市场发展？特别是从自我保护、也就是使国家准备应付外来冲击的角度看，能采取哪些措施？(3) 政策向目前的国际政策建议、守则和标准靠拢会有什么代价或收益？(4) 如何改善目前的国际政策和机制，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目标？(5) 需要哪些国际（区域和区域间）公共政策，才能做甚至最有效的国际金融市场也未曾做过的事情（例如，使财政资源流入属于尚未成形市场类别的发展中国家）？

11. 为共同提供“金融稳定和市场效率”全球公益，进行理想的国际合作必须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这种需求评估或试验将使国际合作植根于国家，即植根于国家利益，并促成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进程。¹⁰

二. 广泛参与国际金融决策不是一种恩惠，而是必须做的事情，以避免出现集体行动和信息问题。

12. 当然，在国际合作方面，强调国家和当地的自身利益，立刻就会引出如何统一不同行动者和利害关系者群体的政策优先事项问题：我们是否具备适当的激励结构以及适当类型的协商和决策程序？

13. 一般而言，提供公益物往往会遇到三类问题。第一类问题是，公益物因其非排斥性，会造成市场失败。例如，一旦别人创立司法制度，任何行动者个人都可以免费利用，那么为什么还要自己出钱这样做呢？此外，所涉费用也许太高，任何行动者都无法独立承担。第二类问题是所谓集体行动问题。同样，货物收益具有公共性，因此单独行动者不愿意出来主动支付费用，即便所付款项与共同合作

¹⁰ Rodrik (2000 年)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经济发展最终产生于土生土长的战略，并非来自世界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应该避免赶时髦，应客观地看待全球化，并把重点放在国内体制建设”（英文本第 36 页）。

努力相关连。¹¹ 第三类问题是：虽然在国家一级，国家往往介入帮助解决这种市场失败和集体行动问题，但其本身无法避免失败。政府从其选民获得的授权不一定能化为相应的行动，这个问题即所谓“政府失败”。

14. 无论多么不完善，在国家一级，我们已确定了一些程序，使所有行动者和利害关系者群体能显示其偏好，使政府能协助它们克服合作的障碍。这并不意味着公益物必须由国家提供。在当今多种行动者的世界上，国家已在很大程度上不直接生产公益物，有时在不同程度上仅提供一些激励，以推动私人行动者遵循预定的政策路线。这也适用于金融市场的确立，尽管其中许多必须的机制最好仍由国家提供，例如财产权、合同法、独立的司法系统。其他一些东西，例如技术准则和标准，则越来越多地由私人行动者提供，至少由他们共同提供。¹² 然而，国际上还没有类似国家体制的机制。因此，适当提供全球公益物的关键是有关各方就以下事项达成共识：要集中哪种类型的政策和要创造哪些共同的国际设施。

15. 然而，除了这些已经十分严峻的挑战，国际金融合作还必须克服另外两种限制。首先，因为有几个国际组织处理金融问题，¹³ 使确保金融稳定和市场效率的总体看法和解决办法变得支离破碎。¹⁴ 第二，越来越多的研究所显示，有关决策机构的构成往往偏向主要市场国家以及金融部门专家和决策者的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和声音以及许多利害攸关者群体的参与和声音往往极为有限。¹⁵

16. 似乎目前的协商和决策模式一再导致作出的决定使发展中国家不适当地承担调整现行金融制度的负担。例如，虽然各方都同意金融调控和监督至关重要，但有些人质疑提出的准则和标准是否“适合所实施国家的国情”（Eichengreen 2001 年第 8 至 9 页），“接受这些准则和标准的国家有什么好处”（Eichengreen 2001 年第 12 页）。准则和标准本身以及关于各国遵守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复杂和昂贵。（可参见贸发会议 2001 年第 79 至 107 页）。用 Soludo 和 Rao (1999 年) 以及

¹¹ 集体问题的一个主要类别是这种免费搭车问题：试图免费享用公益物。另一种与之紧密相连的问题是所谓囚徒的悖论：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对其对应方的合作战略没有把握，因此，无论其他行动者可能怎样做，不合作是最合理的选择，不会造成任何损失，而且如果其他人做出贡献，还有可能不付代价获得收益。

¹² 例如可以提一提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

¹³ 主要的国际组织包括：国际清算银行，其中包括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支付和清算制度委员会、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和国际保险监督人协会以及金融市场稳定论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会计标准委员会）；世界银行和各大区域开发银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此外还有地位同样重要的一些集团：7 国集团/8 国集团、10 国集团、20 国集团和 24 国集团。

¹⁴ 正如 Wyplosz（1999 年第 166 页）所指出：“问题是由有关国家集团或专业协会（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临时特别处理的。现有机构（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经合组织）不断扩大其干预领域，有时相互重叠，有时彼此之间留下空白。”

¹⁵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参见：Buria（2001 年）、Culpeper（2000 年）、Helleiner（2001 年）、货币基金组织（2000 年）、Ocampo（2001 年）和贸发会议（2001 年）。

Park 和 Wang (2001 年)以及 chengreen (2001 年第 12 页)的话说:“收集和处理数据以及加强调控和监督标准都需要技术人员和数据处理员、计算机程序设计员和银行检查员。这种努力无论多么值得赞扬,这些投资可能都要牺牲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的方案,并且面临在缺乏现金的穷国引起强烈政治反弹的风险。”此外,虽然有人在劝告发展中国家更多地依赖私人融资促进发展,但是如果按目前提议的那样执行,《新巴塞尔协定》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重大而广泛的不利影响。¹⁶

17. 一些分析家说(如 Griffith-Jones 和 Cailloux 1999 年, Ocampo 2001 年, 贸发会议 2001 年),人们很少看到作出的决定要求改革全球体制或改变工业国行动者的行为,尽管采取了一些这样的步骤。¹⁷ 显然,如果缺乏有关各方的参与,就有可能损害国家和国际级别的举措之间的联系,削弱融资与发展之间的联系。现在,金融决策者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政策声明强调,至关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参与国际金融决策,作为制订更符合国情、更适当和更有效安排的手段。¹⁸

18. 显然,更广泛地参与金融决策不应被视为一种恩惠,而是必须做的事情,是实现均衡全球政策体制的前提条件,得到所有各方的支持。因此,从长远看,也有可能更切实有效。关于如何拓宽参与金融决策,已经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例如,Griffith-Jones 2001 年;Scholte 和 Schnabel 2001 年)。不过,加强参与国际谈判需要时间、努力和金钱。所以,我们是否陷入恶性循环了呢?

19. 如第 4 点所讨论,确认金融稳定和市场效率具有全球公益性质,也有助于我们找到摆脱困境的可行出路。然而,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进一步讨论一下金融稳定和市场效率的“生产功能”。

三. 只有形成所有组成部分: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措施、公共和私人贡献,“金融稳定和市场效率”的公益物才能出现。

20. 今天关于全球金融问题政策辩论的突出特色常常是不同发言者往往强调某些方面,或者甚至把国家和国际措施、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切问题、或者

¹⁶ 路透社的 David Chance 在就 Griffith-Jones 同 Spratt 的研究(2001 年)进行采访时指出,目前规定银行向 AA 级别的国家贷款无需交备付金,向阿根廷之类 B 级非经合组织国家贷款每 100 美元只需交 8 美元。他接着引用 Griffith-Jones 的话说:“根据[《新的巴塞尔协定》所载]建议,银行可以实行一个内部制度,对于 AA 级国家每 100 美元必须交 60 美分的备付金。但是对与阿根廷相似的国家,每 100 美元贷款必须交 50.40 美元。”有关证明这说法的数据,可见 Griffith-Jones 和 Spratt (2001 年)和 Reisen (2001 年)。此外,还可见《金融时报》2001 年 6 月 9 日对危地马拉中央银行前总裁 Willy Zapata 的访谈第 8 页并可见 24 国集团(2001 年)。

¹⁷ 这个问题可见金融市场稳定论坛高度举债机构工作组的报告,其中要求改进这些机构的披露程序(www.fsforum.org)。不过,到目前为止,对建议行动的后续行动十分有限。

¹⁸ 可参看 Crockett (2001 年),Koehler (2001 年),联合王国(2000 年)第四章和联合王国(2001 年)。

私人和公共投入相提并论。然而，认真考虑所谓眼前全球公益物的“生产功能”，可以看出，各个层面都很重要。关键问题是把它们结合起来。如第二点所示，集体行动问题和利益分歧有时阻碍这方面的进展。另一个障碍可能是对最佳行动方案仍有难以消除的疑虑：生产这种货物最经济的、技术上和政治上最可行的方式是什么？

21. 当然，国际合作的其他领域也有类似问题，例如环境领域。环境领域的决策者以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气候小组）的形式，有效提高了国际社会的认识，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也许，金融领域也可以采取类似办法，可以作为即将召开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后续行动。

四. 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对于实现金融稳定和市场效率的目标至关重要。工业国家的中央银行获得的造币收益可能是适当的资金来源。

22. 必须进行能力建设，才能使国际金融结构的模式植根于国家发展问题，以促进广泛参与国际金融决策，并通过加强参与，更公平地分享国际合作的净收益。

23. 如果我们认为，不那么分割的市场是比较有效的市场，而且目标是所有人都得到发展，我们就可以把金融市场及支助公共政策机构看作全球框架。这个框架的总体质量将取决于其最薄弱环节的质量及规模，即全球化程度如何。因此，要创立确实为发展服务、运作良好的金融市场网络，必须吸收并加强新兴市场 and 即将出现的市场。换句话说，必须为这些市场提供发展援助，特别是技术援助。

24. 人们越来越强调这种援助的重要性。一些双边和多边援助机构正在拟订援助方案。¹⁹ 现有需求很庞大。当然，其他国际体制，包括解决贸易或全球环境问题的体制，也存在类似的能力建设挑战。不过，不能忘记 Eichengreen 上面提出的问題：在满足眼前减少贫穷的紧急需要与投资于全球金融制度的长期发展之间，应如何分清轻重缓急。

25. 从全球公益的角度研究这一挑战可以看出，建立全球金融制度符合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国家各方的共同利益。工业国行动者海外投资的比率越高，这一点就越正确。因此，为加强全球金融制度提供资金完全有理由不使用援助资源，即官方发展援助资金，而要利用额外捐款增加这种资金，特别是比较富裕的工业国中央银行的捐款。金融动荡的风险削减了所有国家货币的价值（购买力）。因此，消除可能造成动荡的现有因素，与每个国家的货币当局都有关系。货币当局可以选择从获得的造币收益为这一努力提供资金（至少在发行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是

¹⁹ 可参看：货币基金组织（2001年）、瑞典国际发展局（2001年）、世界银行（<http://www.worldbank.org/whatwedo/services.htm>）和联合国（2000年）。联合国财政大臣 Gordon Brown 还宣布即将建立“数百万英镑的技术援助设施，使发展中国家能够符合这些国际标准”（联合国2001年）。

这样)。理由是发行健全货币的全部成本高于通常认为的数额，也就是说，要加上能力建设以及可能进行的其他国际合作努力所需的数额。

26. 实际上，已经有双边性质的先例。例如，美国财政部开展了一项技术援助方案，在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援助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²⁰ 万国邮政联盟建立的邮政网络服务质量基金就是有自我完善安排的多边网络中值得注意的一例。²¹ 在这种情况下，援助的理由不是或不仅仅是援助，即不仅是出于慈善或对贫穷的道义关切。援助的理由是一种释放的积极的网络外差因素：投资于使网络对所有各方更有益，使所有成员获得正净收益，甚至包括为网络改善投资提供资金的成员。²²

27. 当然，能力建设的资金需求只是生产“金融稳定和市场效率”全球公益物所需资源总额的一部分。其他需求涉及改善危难条件下官方资金的提供情况（例如，通过适当修改货币基金组织应急信贷额度），或者加强官方发展资助的提供情况，特别是为尚不能吸引足够私人资金的穷国。每个组成部分必须确定最适当的资金来源和模式。

结论

28. 本文探讨了从全球公益物的角度研究金融稳定和市场效率问题时应获得的一些额外政策认识。主要论点是，全球公益物的视角有助于改变有关行动者的激励结构和行为动机，还可以提醒我们牢记必须进行国际合作，才能提供足够的好的“金融和市场效率”，提供不足对大家都不利。因此，找到有效的合作途径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29. 本文提出了更成功地在金融领域进行合作的四个具体途径：(1) 使国际合作植根于国家政策目标和条件，把全球公益物看作现在必须进行国际合作但也必须得到本国各方面积极利用的公益物；(2) 鼓励广泛参与国际金融决策，以此减少出现集体行动和信息问题以及分担负担问题；(3) 使理论界更积极地参与探索“金融稳定和市场效率”全球公益物的可能生产途径，特别是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措施之间的互补性；(4) 利用工业国家中央银行获得的造币收益为发展中国家必要的能力建设提供经费，作为提供健全货币努力的组成部分。

²⁰ 见美利坚合众国（2001年），财政部技术援助处。

²¹ 该基金于2001年7月生效，是新的终端费制度（邮政管理部门之间补偿付款的制度）的组成部分，根据这一制度，发展中国家的终端费增加7.5%，以便为服务质量基金筹集资金。将以特定质量的服务改善项目形式向发展中国家支付资金。该基金估计每年能筹集大约2 000万美元（万国邮政联盟2001年）。

²² 即将出版的开发计划署支持的出版物“提供全球公益：使全球化造福所有人”将讨论业务发展合作的这种网络办法及其理由，并讨论其他为全球公益物筹资的可能模式。进一步资料可见以下网址：<http://www.undp.org/globalpublicgoods>。

30. 过去在民主制、透明度和责任制方面的进展强化了世界各地人们（公众）的发展预期，包括认为公共消费和往往影响所有人的公益物应该更均衡地得到所有各方的利用，而不是使一些人受益，使另一些人付出代价。因此，从全球公益物的视角研究金融稳定和市场效率不仅有益，而且甚至必须这样做，以便如秘书长所强调，“减少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对，并使取得的进步对所有人都发挥作用”。²³ 即将召开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将使国际社会有机会迎接这一挑战。

²³ 秘书长提交给发展筹资问题高级别国际政府间活动的报告见 A/AC.257/12。

文献目录

Buira, Ariel, 2001 年, 《The Govern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油印本)。

Camdessus, Michel, 1999 年, 《国际和金融货币稳定: 一种全球公益物?》在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和金融制度改革关键问题”研究会议上的讲话。5 月 28 日, 华盛顿。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peeches/1999/052899.htm>

Chance, David, 2001 年。《New BIS Rules to Hit Emerging Markets Hard》, 路透社, 5 月 23 日, 伦敦。

Cornes, Richard and Todd Sandler, 1996 年。《The Theory of Externalities, Public Goods and Club Goods》。第二版。堪布里奇, 剑桥大学出版社。

Crockett, Andrew, 2001 年。在 2001 年 4 月 29 日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华盛顿 (油印本)。

<http://www.imf.org/external/2001/imfc/fsf.htm>

Culpeper, Roy, 2000 年。《Systemic Reform at a Standstill: A Flock of “Gs” In Search of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2000 年 6 月, 加拿大渥太华南北研究所。

<http://www.g7.utoronto.ca/g7/scholar/culpeper2000/>

发展委员会 (世界银行理事会和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实际资源联合部长级委员会), 2001 年。《减少贫穷和全球公益物: 进度报告》, 4 月 13 日, 华盛顿。文件 2001-0007。 <http://www.worldbank.org/springmeetings/> 或 [http://wbln0018.worldbank.org/DCS/devcom.nsf/\(documentsattachmentsweb\)/April2001EnglishDC20010007/\\$FILE/DC2001-0007\(E\)-GPG.pdf](http://wbln0018.worldbank.org/DCS/devcom.nsf/(documentsattachmentsweb)/April2001EnglishDC20010007/$FILE/DC2001-0007(E)-GPG.pdf)

Eichengreen, Barry, 2001 年。为货币基金组织/KIEP 亚洲危机后复兴问题会议 (2001 年 5 月 18 日至 19 日, 汉城) 编写的《加强国际金融结构: 公开的问题, 亚洲的关切》。 <http://elsa.berkeley.edu/users/eichengr/seoulcoe2.pdf>

金融市场稳定论坛, 2000 年。公开版本。 <http://www.fsforum.org>

Griffith-Jones, Stephany, 2001 年。《加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金融施政的建议》(油印)。 <http://www.ids.ac.uk/ids/global/finance/pdfs/prop.pdf>

Griffith-Jones, Stephany 和 Jacques Cailloux, 1999 年。《鼓励较长时期: 机构投资者和新兴市场, 研究议程》, 开发计划署, 纽约, 发展研究处 (发研处) 讨论文件 16。

Griffith-Jones, Stephany 和 S Spratt, 2001 年。《拟议新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纯粹的消极影响吗？》联合王国 Sussex 大学发展研究学院（油印本）。

Helleiner, Gerald, 2000 年。《市场、政策和全球化：能否使全球经济变得文明？》，《人的发展杂志》第 2 卷第 1 期。

<http://www.unctad.org/en/docs/prebisch10th.en.pdf>

国际货币事务和发展问题二十四国政府间集团（24 国集团），2001 年。《公报》，4 月 28 日。<http://www.g24.org/04-01eng.htm>

货币基金组织，2000 年。《配额办法审查小组给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局的报告》，4 月 28 日。<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nb2000/nb0090.htm>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1 年。《技术援助 - 情况介绍》。<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tech.htm>

国际金融机构咨询委员会，2000 年《报告》（“Meltzer Report”），华盛顿。<http://www.house.gov/jec/imf/ifiac.htm>

Kaul, Inge; Isabelle Grunberg 和 Marc A. Stem 合编，1999 年。《全球公益物：21 世纪的国际合作》，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Koehler, Horst, 2001 年，《公共-私人合作实现金融稳定》，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国际金融学院的讲话，5 月 31 日。<http://www.imf.org/external/np/speeches/2001/053101.htm>

Lindblom, Charles, 2001 年。《市场制度：市场是什么，如何运作，有何收益》，纽黑文：耶鲁大学。

Ocampo, José Antonio, 2001 年。《国际不对称和国际金融制度的设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第 15 号工作文件。

<http://www.eclac.org/publicaciones/SecretariaEjecutiva/5/1c11525P/s15L1525iok.pdf>

Park Yung Chil 和 Yunjong Wang, 2001 年《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需要什么样的国际金融结构？》，为亚洲经济小组讨论会编写的论文，4 月 26 日至 27 日，堪布里奇。Eichengreen 曾引用（2001 年）。

Reisen Helmut, 2001 年。《巴塞尔二号会促成国际资金的汇流吗？》（油印本），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经合组织，巴黎。Griffith-Jones 和 Spratt 曾引用（2001 年）。

Rodrik, Dani, 2000 年。《下个世纪的发展战略》，向“21 世纪的发展经济学”会议提交的论文，发展中的经济体研究所，日本外贸组织，1 月 26 日至 27 日，日本。

<http://ksghome.harvard.edu/~d.rodrik.academic.ksg/devstrat.PDF>

Scholte, Jan Aart 和 Albrecht Schnabel, 合编, 2001 年。《民间社会和全球金融》东京：联合国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瑞典国际开发署，2001 年。《瑞典对金融市场的援助》。

<http://www.sida.se/Sida.se/Sida/jsp/Crosslink.jsp/d,171/a,5175>

联合王国，2000 年。《消除世界贫穷：让全球化对穷人发挥作用，关于国际发展的白皮书》，国际发展大臣向议会提交的文件。

<http://www.globalisation.gov.uk>

联合王国，2001 年。财政大臣 Gordon Brown 在 4 月 24 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度会议上的发言（油印本）。

<http://www.hm-treasury.gov.uk/speech/cx240401.html>

联合国，发展筹资问题高级别国际政府间活动筹备委员会，2001 年。《秘书长给筹备委员会的报告》，纽约，A/AC.257/12 号文件。

<http://www.un.org/esa/ffd/aac257-12E.htm>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2001 年。《2001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http://www.unctad.org/en/pub/psltdr01.en.htm>

美利坚合众国，2001 年。财政部技术援助处。<http://www.ustreas.gov/iet/>

万国邮政联盟，2001 年。服务质量基金。<http://www.upu.org>

世界银行，2001 年。《2001 年全球发展筹资》。

<http://www.worldbank.org/prospects/gdf2001/index.htm>

Wyplosz, Charles, 1999 年。Inge Kaul, Isabelle Grunberg 和 Marc A. Stern 合编《全球公益物：21 世纪的国际合作》中“国际金融稳定”，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第 152 至 189 页。

